尘封的老人 之 民以食为天

■ 阿 航

那段日子,正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时期。电视上报纸上每天都在说这件事,一时沸沸扬扬。一般的人,听归听,看管看,该干吗还是干吗。战场距离那么遥远,况且是局部性战争,影响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的。可对这几位老人来说,却是震动颇大。在“活鸡宴”桌面上,老人们对我说,你是没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,不晓得厉害的!一位眼睛不太好使的老人舞着手说,现在全世界打一个小国家,太不公道了!另一位老人道,武器没办法比的,老虎吃蝴蝶。大伯接过去说道,这难讲,萨达姆听说有核武器,真把他逼急了拿出来爆破,只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!这些可说已尘封的老人,没想到对国际动态如此热衷议论,这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老人们开始行动起来,大肆购买粮食。他们往往三俩人合伙,不知从哪儿找来小推车,从超市里往家中搬运整袋的大米,大包装的面粉,汗流浃背,乐此不疲。李姓老人家的粮食,我亲眼目睹过的,占了小半间房子,码得整整齐齐。初看一眼,还误以为这是粮仓呢。

原来,这些经历过二战的老人(除大伯外),人人都是有故事的,人人都因了中国的古训“民以食为天”而受益匪浅。二战前夕,物资吃紧,黑云压城城欲摧。我的这些在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的乡人,个个忧心忡忡——同时,他们精神抖擞,摩拳擦掌。他们倾巢而出,将所有钱财用来采购果腹的食粮,工蚁一般往窝里搬运。番人则根本没这种理念,他们高枕无忧,家里的食物顶多够对付个把礼拜吧。随着大饥荒的步步逼近,粮食自然而然地成了头等大事。番人们就苦了,他们饿得眼睛发绿,纷纷流落街头。家中有存粮的乡人们,这下子腰杆子硬了,他们三五成群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东走西逛,牛气得很!据说最初是一位陈姓乡人捡了漏。面色红润的陈姓乡人经过某街区时,与一位妙龄法国女郎对上了眼。法国女孩和家人在一块儿,裹着毯子躺靠在高楼大厦的墙脚根。寒风中,她瞧见步履稳健的陈姓乡人阔步而来,不觉十分惊讶,难免多看了几眼。陈姓乡人的脚挪不动了,扭扭捏捏样子。女孩父亲问道,你家有吃的吗?如果有,我女儿就跟你走了。这个口子一开,可不得了,几乎当年所有滞留于巴黎的乡人,全都领回了一位如花似玉的法国女郎。在战争年代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,我的这些乡人们倒是过上了几年可称得上幸福的日子。他们勤俭持家,让有限的粮食细水长流,让小日子无处不充盈着小殷实和小满足。在这段日子里,他们每个人都有了一男半女,延续了血脉。可好景不长,随着战争的结束,那些法国女人领上孩子远走高飞了。因为说到底,他们的组合是不对称的,文化背景的差异太大,是没法子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的。

现在,伊拉克战争爆发。老人们从中嗅到了战争的火药味,他们遵循古训再度“广积粮”。老人们心里踏实了,便相互取笑开来。吴姓老人五十步笑一百步地奚落李姓老人道,你这个老不死,黄土都埋到脖颈根了,还想讨便宜啊!傅姓老人说就是嘛,走路都打抖了,花心不死嘛。李姓老人反驳道,你们藏的比我少?傅姓老人道,我算年纪,吃不了那么多粮食了,这次真的没拉几袋米。李姓老人道,到时没饭吃可别跑我这儿来哭穷!大伯总结性说道,你们放心,也别贪心,仗打不起来了,最新新闻报道了,萨达姆没核武器!

子牵我的心

■ 炳 棣

一九八七年四月的北京,春意浓浓的,垂柳飘绿。

七日下午,我送儿子董海走进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室那一刻起,心里不安起来,我步出候客厅,一会儿看看表,抬头看看天,一会儿,又看看手表。坐立不安,站在一处观望晴空,见一架银色飞机腾空而起,我目不转睛地看看着,直到飞机消失在蓝天白云的深处。

海儿飞走了,我的心悬了起来,别看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了,却是十六岁的少年,从未出过远门,更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身边。如今却独自一人去国外谋生。先到罗马尼亚,再转火车。这对于一个不懂英语,初次到异国他乡的孩子能成吗?孩子的阿姨能接到他吗?

我乘小车离开机场,已经时近黄昏,昨晚一夜没有睡好,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准备了,够累的了,我在车里闭目养神。然而海儿的那张像他妈妈的脸蛋,那双大大的明亮眼睛,就在我的眼前晃动着。不知是心灵相通,还是幻觉,我总觉得孩子在机场里哭,在高声地喊“爸爸、爸爸!”

我三十岁得子,全家人视为珍宝,孩子笑了,我们开心;孩子哭了,我们担心。那时候,我和孩子他妈在国防小三线工作,上班的时候将孩子关在家里。然而我在政治处里办公,心神不安,一有空间就回宿舍看看。刚走进大门,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声,我急匆匆回到家,吓了一跳,海儿睡醒了,爬到五斗柜子上拿糖吃,把热水瓶弄翻了,开水烫了他的小手,烫了他的屁股。打那以后,我把刚满二岁的海儿送往县人民政府一家托儿所,孩子却大哭大闹紧紧用小手抱住我的脖子,我狠狠心,让战友抱他进院。这一夜我跟他妈都失眠了,直到天亮,似乎还能听到孩子的哭喊声。

海儿天性顽皮、聪明,他六岁那年,就读小学二年级了。上学的时候,有老师管教着,放假的时候,得家长看管。自从邻居蒋师傅的独子去水塘里玩水,出了事故以后,我和孩子的妈时刻担心起来,将孩子看得紧紧的,一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家里。那一天我忘记了锁门,就忙着上班了,正在办公室里听电话,突然有个阿姨气喘吁吁地跑来说:“董干事,你的孩子从楼上掉下来了。”我吓得心惊肉跳,手中的电话筒掉到桌子上,拔腿就往家里跑。后面传来阿姨的声音:“你儿子把门紧紧关着,我们怎么叫也不开门。”

我听了更急了,三步并着二步登上楼,伸手急急敲响家门,说:“海儿,爸爸回来了,快开门。”

话声刚落,房里就传出了孩子的“哇哇”哭声,门开了,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只见孩子双手拿着一条白毛巾,紧紧捂住脸的下巴,血已经染红了白毛巾。我不知道孩子他妈何时进屋了,她脸上挂着泪珠,赶紧抱着孩子往单位医院走,我紧跟出门,迎面有个孩子哭着说:“叔叔,不是我,我……”结结巴巴又说:“刚才我和董海同学下象棋玩,我输了,董海赢了,高兴地拍手叫好,二脚踏空,掉到楼下泥地里。”孩子又大哭起来,我顾不及这一切,上了救护车,护送孩子上地区医院去了……

我回到北京前门一家下榻的旅店,夕阳下山了。我坐在床头的电话机旁守候着,喝了几口水,啃了两个面包,心里想着儿子的前景,便拿出一张彩色照片。这是我和海儿在天安门前的合影,我看着孩子那身“中国”标记的大红的球衫,托起那张红扑扑的脸蛋,脸上那双迷人的大眼睛,亮亮的,仿佛在看我,那张嘴似乎在顽皮的动着,喊着爸爸和妈妈。我说:“孩子,你出国打工,挣了钱,不要忘了家,忘了你是中国人。”海儿点点头,我放下心了。回来却又吊起心来,孩子能在异国他乡谋生吗?

电灯亮了,我小妹和几个乡友都从机场送客回来了。小妹一进房门就责怪说:“大哥,你怎么先走呢?你刚一走,海儿就要爸爸了,还大哭起来。”

我将一杯开水递给小妹,她喝了两口,又说:“机场检查旅客护照、机票的时候,发现有的是改签日期的,便把旅客的护照统统收起来检查,足足两个小时,耽误飞机起飞时间,乘坐这趟飞机到罗马尼亚转机的青田旅客有三十多人,把大家急坏了,都寻找你,去问机场领导。”

我听着听着,赶紧给国外三妹打电话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意让孩子出国,惹出这么多麻烦事。想起这家旅店里竟然都住着青田人、温州人,他们有的是送亲人出国的,有的是来办签证的,我是第二次住进这家旅店。第一次来北京是给海儿办签证,是被家乡刮起的一股出国风刮来的。

改革开放初期,祖国百业待兴,急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。我的家乡青田虽然是侨乡,却是个贫困落后的山城,大家都被穷怕了,而一些老华侨回乡探亲,可富有了,带回来的外币很吃香。当时许多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是高收入,省吃俭用,把挣来的钱捎回家投资、造路、盖房子,生活过得好,乡亲们很羡慕,纷纷效仿,所以掀起了出国热,有的是亲带亲,有的是友带友,有的设法托“蛇头”买护照,飘洋过海,似乎在西方那些国家里,遍地是黄金。尽管当时华侨华人受洋人的歧视、冷落,还是有很多很多乡人找门路出国谋生。

我妻子的几个弟妹都在意大利经商,创办了几家中国式的餐馆,缺乏劳力……海儿自从出了事故之后,便回到了故乡他外公外婆身边读书。受到出国风潮影响,认为书读的再多,不如到外国挣钱多。海儿中学刚刚毕业,就去职业学校学习烹调技术,为出国做准备。

签证时,我持着《中国建设》杂志社的特约记者证,带着海儿去埃及大使馆,使馆的大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,都是要办出国签证的。驻中国的埃及大使看了我的记者证,说:“《中国建设》(《今日中国》)是孙夫人宋庆龄创办的,发行海内外,我读过英文版,很好,很好。”大使一边说着,一边仔细观看我儿子董海的护照,又打量一下海儿,突然用英语说:“Your son is so beautiful(真是个漂亮英俊的小伙子)。 ”马上提笔签了名,又在护照上盖了钢印,客客气气地说:“先生是中国记者,我们欢迎你!”

如今我第二次来北京,一来是送子出国,二来是到外文出版局《中国建设》编辑部校对书稿。故迫不及待地离开机场,先到百万庄,后才回旅店,不知海儿在机场里哭了。

电话接通了,我把海儿的穿戴——标有中国标志的大红球衣——反复说了几边,三妹问:“孩子几点钟到罗马机场?几点钟坐火车往德国?中途在哪个站下车?会不会打意大利罗马的电话?还有……”这一连串的问话,我都答不上来。

我听着听着,想起在海儿出国之前曾用英语、中文将电话、到站地址等要点写在纸上,而现在这张纸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,急得我心里直跳,幸亏小妹接过电话,把和海儿同道的一个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三妹……

次日,接到了海儿安全到达的消息,我赶紧打电话告诉身在故乡青田的妻子,妻子听了之后说:“不知道海儿的居留证办得顺利不顺利,是干大厨呢,还是当二厨?”

妻子的话,把我刚刚放下心来的心又悬了起来。

摄影/洪则新

歌乐山

■ 陈建毅

去年冬天,我去了重庆,去了歌乐山。

还是在八岁的时候,在山口中心小学读书,看过《红岩》连环画,知道重庆有滓渣洞、白公馆监狱,知道双枪老太婆。十多岁的时候看了长篇小说《红岩》,对此有了更多的认识。之后陆续从其它方面对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有了深入了解。因此对歌乐山印象深刻,想找个机会去看看,也算是对先烈的一种缅怀,一种敬仰。

这次女儿陪同我去歌乐山,因为都是初次来,对路径陌生,在歌乐山下跟着当地导游上去的。行走在歌乐山,我发现脚下的石板路台阶很光滑,这是被来此参观的人们“磨” 出来的,由此可见,来歌乐山的人是非常多的。

如果不是长篇小说的《红岩》描述,光从外观上看,谁也想不到这山里会有秘密监狱,当时关押着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。歌乐山树木茂密,大树参天,与附近别的山没有特别之处,人们思想上根本不会把它与监狱想到一块。据滓渣洞监狱记载就关押过三百多名政治犯,几乎都是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遇害。滓渣洞监狱牢房的墙上还贴有曾经关押在此的共产党人照片。其中有两间牢房是用来关押女共产党人的,包括我们熟知的江姐就关在这其中的一间牢房。而隔壁则是刑讯室,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。

就是在这里,江姐等共产党人经受了种种酷刑磨难。看着刑讯室里各种刑具,我好像听到国民党西南地区特务头子徐远举也就是《红岩》里的徐鹏飞对着江姐狂喊威胁:“美式的刑具四十八套,滓渣洞的白骨比山高,江小姐,你要好好想一想啊。”但面对这些刑具折磨,江姐以惊人的意志誓死不屈,保护我党的秘密。让我们敬佩,敬仰!我不由想到《红灯记》里的另一个共产党人李玉华,面对日寇的刑具折磨,铁骨铮铮。发出“共产党人钢铁意志,视死如归”的呼喊。《红岩》与《红灯记》中的共产党人虽然在不同地方,一南一北相距万里,但都有宁死不屈的坚强革命精神,不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在歌乐山,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“小箩卜头”,白色的、仅一米高的雕像坐落在白公馆大门里面一侧。天真无邪的双眼望向远方,赤脚坐着,脚趾头大拇指调皮地向上翘起。八岁的他,应该充满美好的幻想,期盼有美好的童年生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会被国民党特务们残酷杀害。

有人给他的雕像系上鲜艳的红领巾,这是一种深深的怀念。他父亲宋绮云因为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,在杨虎城将军被捕后也跟着被捕。1949年的冬天,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害,接着宋绮云也惨遭杀害。军统特务们甚至连这个才八岁的小箩卜头都不放过,一并残忍杀害。

重庆的冬天是寒冷的,而1949年的冬天,乘胜追击的解放军进军大西南,隆隆的炮声已经传到重庆。惊慌失措的敌人在仓惶逃窜前,还不忘对歌乐山这里关押的政治犯展开疯狂的大屠杀。滓渣洞、白公馆数百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残酷杀害,使歌乐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陡然增加了几分寒冷的血腥。

一本《红岩》,使世人知道歌乐山,缅怀歌乐山。歌乐山,你的名字是和烈士们鲜血浇连在一起的呀,也因此才有《红岩》。

曾经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军统特务徐远举,杨进兴等人最终也并没有逃脱,先后落网,得到他们应有的征罚。

那天,并不是节假日,但是歌乐山的路上仍然到处是人。白公馆地牢那短短的几米台阶挤满了参观的人们,水泄不通。可想而知节假日从全国各地来瞻仰烈士的人们是何等的多,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歌乐山的石台阶这么光滑了。

歌乐山,你有一个多么文雅和动听的名字,怎么会有这么多惨烈的残酷的往事发生,演变成为国民党特务们的秘密杀人场所?《红岩》中徐鹏飞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,曾一口否认磁器口即歌乐山附近有秘密监狱。

我今天来歌乐山,仿佛是在经历一场革命洗礼。

寒冷的晚风掠过,树木摇曳,树叶飘洒而下,森林发出低沉婉转的呼啸声,似乎在为烈士们送上一首深情的缅怀歌乐。在这里我也深深地体会到《红岩》中“歌乐山下悟道,滓渣洞中参禅”的特殊含义。

桔子花飘香时(四)

■ 刘景爱

浸润在桔子花香里,记忆变得丰满多情,它像一条长藤,紧紧地缠绕在某个时日里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只要一阵花香飘来,就让我毫无征兆地回到那个清晨,像一次穿越,那天所有的行程和细节,变得明朗。

二十年前的4月26日,一个周日早上,在温溪镇大滩上。

温溪镇离县城只有10公里的路程。那个周六,我和曾骑着自行车到温溪赴约朋友,还在朋友的宿舍过了一夜。年轻的时候,10公里的路程是漫长的,漫长到可以在朋友那里过上一夜。唯有青春飞扬时,兴致才会像河水漫过心头,留下人生难忘的旅程。

那次过后,我已经很少骑自行车。回味所有骑过自行车的日子,唯有那次的经历最愉快。那天的阳光柔得像一团发酵的面,斜斜地淌到脸颊,让我们整个身子光芒四射。迎面扑来暮春的风,轻扬发际,温柔惬意,荡漾心扉。放眼四周,大地葱茏,陌上芳菲浸染。暮春的美,是丰润的美,它让自然界更加地丰富多彩。

也许是感受到骑自行车的自在,放飞心情的快乐,让我满怀激情。我信誓旦旦地对曾说,我一定要骑着自行车周游浙江。这话像一份我承诺烙印在我的心中,常叩击心扉。这也是一份实现不了的承诺,因为早早地得了膝关节炎。那次的自行车行程也成了我骑自行车最长的行程。而这份年轻时的承诺里包含着激情飞扬的青春记忆,到中年以后,时时回到过去的时光里缅怀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我和曾大概是属于缘分很深的朋友。她为了爱情,从湖南郴州嫁到我们的这个小城。初来时,她在文联工作。我是文学爱好者,常到文联办公室走动,不经意间相识相交,成了无话不谈朋友。那时我们商量着各自的婚期,决定在在同一个月份举行婚礼,我比她的婚礼早了十天,后来孩子又在同一年出生。因为又有这样一层关系,缘分就更深了。随着岁月的积淀,我们之间的友情像陈年的老酒,在每个日夜里芳香四溢。

记忆可以还原那时所有的足迹。温溪的两个朋友热情地接待,像春天的暖阳,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暖意。那时朋友张君刚刚失恋,强打着精神和我们在一起。午饭后,朋友带我们去观看瓯江边的古榕树群。温溪的古榕树群,是有名的景点。这里将近有二十来棵树龄上百年的榕树,树龄最大的一棵有800多年,其壮观非同一般,是很多电视电影的外景拍摄基地。在古榕道上行走时,朋友介绍说,温溪大滩的景色不错,第二天去温溪大滩走一走。

大滩是瓯江上一个小岛屿。十分钟的轮渡,把我们载到一个世外桃源。

从碎石小径走进来,泥土的芳香沁入心脾,空气十分清甜。这里似乎是个大森林,到处都是青翠欲滴。瞬间,视觉、听觉、嗅觉被葱郁的树林,嫩绿的小草,清脆的鸟声,迷人的花香深深地吸引。四个人走在小径上,说话的声音在树林里回绕,和滑落的鸟声融合在一起,似一曲欢快的小夜曲。阳光从穿过密密匝匝的树叶,在地上留下细碎斑驳的影子,随着风四处跳跃,如一只只小精灵跟随我们前后左右。感受到了静谧,我们收回了兴奋,再不敢高声语,恐怕惊吓了鸟,惊吓了树和小草。此时,唯有脚步声在林子里回响,唯有小鸟的清脆的鸣叫,唯有大地发出隐隐约约的声响,如人的心脏在跳动。

穿过这片静谧的树林,周边有金黄金黄的小麦,麦穗沉沉地挂下来,清风徐徐而来时,掀起一片金黄色的麦浪,麦浪像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,柔软的身姿统一地倾斜,又统一地站直,如此地来回舞动,仿佛是仙女降临人间。不知何时,一股熟悉的清香弥漫在我的身边,四处张望寻找,找不到花的影子。这花香,早就沉淀在我心中,只需微微地一点,完全可以唤醒我的嗅觉。这花香,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和紫涵在山上采摘野草莓和“麦笛子”的情景,紫涵到欧洲多年了,那时我们的关系尚好。和紫涵在山上时,桔子树就在麦田上面的山坡上,花香整片地飘下来的。此时在这片金色的麦田里,我却找不到它的树影。目光向周边寻找,找不到桔子树的身影,再向更远处眺望,那是一片宽阔的江域,江水很浑浊,捕鱼的小船在江中央缓缓行驶。我闻到的桔子花香,是从何处而来,至今仍然是个迷。难不成是一种的幻觉?

麦浪里的桔子花香,让我的记忆常定格在那曼妙的一刻,那疑问的一刻。在那片葱郁的树林,那团滑落的鸟声,那片金黄的麦浪,让我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前行,冥冥中仍然在寻找花香的来处。

佛家说,世间万事万物皆是众缘和合,缘聚则生,缘散则灭,都是在迁流变化之中。佛家的话讲得透彻。感悟人生的变化时,那句“缘聚则生”,会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感;那句“缘散则灭”,会化解很多心中的不舍,包括果树园、小叔和紫涵。